

河东风物

# 一通明代画像碑上的 司马光和薛瑄

□李思虎

司马温公祠里有一通明代石刻画像碑，碑青石质，立式，高63厘米、宽32厘米、厚12厘米。看似平淡无奇，但这通碑刻却不同凡响，一是碑阳与碑阴分别篆刻着司马光与薛瑄二人的画像；再者，此碑是马彦、马珂与马化龙祖孙三代人通力合作的结果。

## (一)

先看碑阳，碑首刻行书大字：宋涑水司马文正公真像。画像居中，刻司马光拱手、背微驼、侧身、着老年便服小像。像上方居中刻司马光《自题写真》七言绝句一首：

黄面霜须细瘦身，从来未识漫相亲。

居然不肯市朝往，骨相天生林野人。

作者自述面容清瘦，面带霜色，胡须稀疏，一副清雅脱俗的形象；“漫”指世俗纷扰，“相亲”指应酬往来，此句表达诗人向来不屑于参与世俗的社交活动；“市朝”指官场或繁华都市，诗人以“居然”反问，强调自己坚决不留在世俗中；“骨相”指天生气质，“林野人”指隐居山林之人，表明作者骨子里就具有隐逸的倾向，如同山林隐士。

全诗通过外貌与心境的结合，塑造了一个超脱世俗、向往自然的高洁形象。司马光以自题写真，既展现个人修养，也流露出对官场纷扰的疏离感。

像左为明朝文学家、思想家方孝孺《司马文正公赞》四言诗一首，对司马光予以高度评价：

儒者之泽，大行于民，伊周以来，惟公一人。

始末可为，万钟不受，逢时多艰，为世父母。

凡民之心，惟久乃安，欲其即从，圣人犹难。

亦独何修，政化神速，诚於为善，四海悦服。

用术相欺，惟恐不深，公神在天，汝果何心。

(伊周，商朝的伊尹和西周的周公旦，二人都曾摄政。)

像右马彦作跋，时间为嘉靖三十五(1556年)九月十五。马彦，明夏县人，力学敦行，极仰慕司马光为人，因司马光号“迂叟”，自号“希迂子”。马彦学问渊博，布衣终生，著有《温公年谱》等，著述甚多，藏于家。嘉靖年间本县许多碑刻都是由他撰文，为人刚直敢言，史称“对妻子如严宾(贵宾)，待亲朋以诚信，遇患难读书不辍”。

马彦的后记里，记述了立石的始末缘由，其中还提到了嘉靖三十四年大地震“书院倾颓，旧石覆没”。

碑阳落款为：涑水晚学马珂顿首谨书。

## (二)

再看碑阴，薛瑄画像居中，为



▲碑刻拓片，碑阳与碑阴分别篆刻着司马光与薛瑄画像。

拱手、官服、老年正面站身像，碑上部刻正书大字：大明河汾薛文清真像，像上方居中为薛瑄《临终口号》七言绝句一首，最后一个通字尚未写完，他便溘然长逝：

土床羊褥纸屏风，睡觉东窗日影红。

七十六年无一事，此心惟觉性天通。

首句描述了作者极其简朴的生活方式，土床、羊褥和纸屏风。其次是他临终时的场景：东窗下的日影映照进来，给人一种宁静和安详的感觉；作者回顾76年以来，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事。末句表达了弥留之际的感悟：觉得自己的内心与天性相通，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。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作者一生的清廉和正直，临终前的平静和超脱，更展示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。

像右为马彦《薛文清真公赞》诗一首：

睹公之容，温然其可亲，谛公之色，肃然其可敬。

有程正叔(程颐)之端严，司马公之纯正，

心能默契乎前贤，学必精求乎往圣。

盖一代之硕儒，盛世之思孟(儒家学派中子思与孟子的合称，子思，孔子的孙子)也。

落款为：隆庆辛未仲春望日(1571年农历二月十五)，孤男马珂泣血谨识(郑重记叙)。

像左为马彦之孙马化龙所作的后记，简述其镌刻薛瑄画像的缘由：祖父马彦仰慕薛文清公为昭代硕儒，且其是距夏县不远的同乡，故打算在司马温公画像碑之碑阴镌刻其遗像，但没有完成就去世了。马珂泣命(哭泣着叮嘱)马化龙：寻找薛瑄的遗像，绘铸到碑阴，上题薛瑄“临终自题口号”和马彦对他的赞颂诗。

可见，马化龙是秉承了祖父和父亲的遗愿，于隆庆五年完成了薛瑄的石刻画像，比温公画像晚了15年时间。

马化龙，万历丙子举人，授陕西延安府通判，后任直隶河间府通判，史称“多有循绩(良好的政绩)，为人诚谨，好学能歌，乡人称为古君子”。



## (三)

众所周知，司马光和薛瑄都是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，他们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前者以史学和政治成就著称，后者则以理学和教育成就闻名，他们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信念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细究起来，两位河东先贤在道德操守、学术贡献、政治生涯、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颇有相似之处：

他们都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堪称造诣精深的“大儒”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强调儒家的道德和治国理念，薛瑄则创立了河东学派，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发展，开创北方理学新潮流。

宋代以后，民间和儒学界把孔子、孟子和司马光并称为“儒家三圣”，体现了对司马光的治学理念和品德风范的尊崇；薛瑄则被后世誉为“明代醇儒，瑄为第一”“明代第一廉吏”，他是明代首位从祀孔庙的贤臣，享誉民间。

他们都清廉自守，甘于清贫。司马光家贫无钱葬妻，薛瑄临终前家徒四壁；在政治生涯方面，他们都曾遭遇过挫折，但都初心不改，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，一生光明磊落，刚正不阿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。

他们都非常重视教育。司马光在编撰《资治通鉴》的同时，也注重培养后学；薛瑄则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聚徒讲学，培养了大量人才。

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马彦就是司马光和薛瑄的“铁粉”，并感召和影响了几孙。怀着对先贤的无限敬仰，祖孙三代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一集雕刻、绘画、文学和历史于一体的杰作。数百年后，我们才能有幸在这样一通碑刻上，同时瞻仰到二位先贤的风采，感悟他们历久弥新的人格魅力。

钟灵毓秀，名人辈出，河东大地能造就出司马光和薛瑄这样的旷世英才，我们倍感自豪。尤为令人欣喜的是，他们虽然相隔300余年，但是却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，实现了跨越时空的遇见。

## 楹联选粹

### 黄金水岸和园厚德景观门 楹联文化赏析

□冯文俊

一、上联：儒释道教传国粹——多元思想的共生传承

1. 三教合流的文化根基  
儒：以“仁”为纲，构建伦理秩序(如“修身齐家治国”)，奠定社会人伦基础。

释：本土化后重“心性觉悟”，以慈悲智慧深化哲学思辨(如禅宗“明心见性”)。

道：“道”法自然，倡导无为而治与生命修炼，体现中国人对宇宙规律的探索。

“教”的双重意涵：既指思想体系，亦含“教化”功能，三者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核心“国粹”。

2. 传承的生命力  
“传”字凸显三教历经千年积淀，通过典籍、礼仪等渗透于思维与行为(如儒家忠孝、道家生态观、佛家包容)，至今仍具现实价值。

二、下联：天地人和耀中华——和谐理念的终极升华

1. 三合一的哲学内核  
天地：象征自然规律(道家“天人合一”)与社会秩序(儒家“礼序乾坤”)，代表客观世界。

人和：聚焦人际和谐(儒家“和而不同”)、身心平衡(佛家“止观”)，强调主观伦理实践。

“和”的深层逻辑：贯通《孟子》“人和”的政治智慧、道家“万物一体”的生态观、佛家“缘起性空”的整体思维。

郭璞与“死马当活马医”

□郭亚茹

我是闻喜县裴社镇南郭村人，不过，我可不是“南郭先生”，而是两晋时期著名堪舆学大师郭璞的后人。

我们这一带有好几个带“郭”的村庄：上郭、北郭、西郭等，据学者考证，这里就是郭璞的故乡。

郭璞生于公元276年，死于324年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。他既是堪舆学鼻祖，也是文学家、训诂学家。郭璞一生勤于笔耕，著作颇丰，主要有《山海经注》《尔雅注》等。郭璞给后人留下很多故事，“死马当活马医”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则。

晋惠帝时期，河东地区受到异族侵扰。郭璞感叹道：“唉！百姓将沦于异族，故园将废为荒漠了！”于是，他暗中集结亲友数十家，到东南地区避难。一天，一众人抵达将军赵固的地盘。郭璞和赵固是好朋友，就前去拜见，但是被守门人给拦住了。守门人说：“将军吩咐了，今天不

维，形成“宇宙-社会-人生”的系统认知。

2. 时代价值的映照  
“耀”字既忆汉唐包容之盛，亦指当下启示：

生态：以“道法自然”呼应“两山论”，推动可持续发展；

社会：以“天下为公”契合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促进文明互鉴；

心灵：以“心性修养”缓解现代焦虑，实现身心和谐。

三、对联的艺术与现实启示

1. 对仗工整，层层递进  
上联“儒释道”与下联“天地人”形成名词对仗，“传”“耀”动词呼应，从“传承”到“彰显”逻辑递进，语言质朴而意境深远。

2. 当代文化的精神坐标  
自信之源：三教共生印证中华文化的包容性，是文化自信的根基；

实践路径：倡导以儒家修身、道家处世、佛家修心，实现个人与自然、社会的和谐统一；

未来指向：以“和而不同”智慧应对全球化挑战，推动世界“美美与共”。

这副对联以极简笔触勾勒中华文化的“多元共生”与“和谐之道”，既是对传统的凝练概括，亦为当代提供解决生态、社会、心灵问题的东方方案，彰显中华文明“守正创新”的永恒生命力。

接见任何客人，因为将军最喜欢的一匹好马死了。我家将军非常痛惜，心情很不好，还望先生明日再来。”郭璞听完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！你去告诉赵将军，我可以死而复生。”守门人不敢怠慢，赶紧把情况告诉了赵固。

赵固一听是郭璞来了，赶紧出门迎接，说：“先生来的太好了，您真的能够使我的马复活吗？”郭璞说：“当然可以，需要让二三十位健壮的男子都手持长竿，向东行走三十里，遇到丘陵或祭坛祖庙，便用竿拍打，能够得到一种东西，取而迅速赶回。得到这种东西，死马便复活了。”赵固按照郭璞说的去做，果然得到一种似猴的动物回来。这动物见到死马，在马鼻处嘘吸。很快，马站立起来，奋蹄嘶鸣，进食如常，马活了！大家再找那动物时，已经踪迹皆无。赵固高兴极了，给了郭璞很多钱来表达谢意。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俗语即源于此。